



『汉书』论稿

HANSHU LUNGAO

田文红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责任校对:彭程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论稿 / 田文红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614-7882-0

I. ①汉… II. ①田… III. ①中国历史—西汉时代—纪传体②《汉书》—研究 IV. ①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935 号

书名 《汉书》论稿

著者 田文红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 7 5614 7882 0
印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插页 1
印张 8.375
字数 22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汉书》	
——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	(1)
一、《汉书》的编撰	(1)
二、《汉书》的体裁特点与史学成就	(22)
三、《汉书》的研究与流传	(36)
第二章 《汉书》的史论及其评史方法	(55)
一、从“君子曰”到《汉书》史论	(55)
二、善于利用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发论	(58)
三、突出历史的重大变化和特异现象	(60)
四、对西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	(66)
第三章 《汉书》的民族史撰述	(71)
一、《汉书》民族史撰述的结构体系与叙史风格	(71)
二、《汉书》对各民族经济文化与交流的记载	(95)
第四章 《汉书》的鉴戒史观与神鉴史观	(117)
一、《汉书》的鉴戒史观	(117)
二、《汉书》的神鉴史观	(151)
第五章 《汉书》四志述评	(165)
一、略论《汉书·刑法志》	(166)
二、《汉书·食货志》与班固的经济思想	(177)
三、《汉书·地理志》与班固的地理思想	(189)

四、《汉书·艺文志》评介	(206)
第六章 《汉书》杂论	(218)
一、刘知几对班固《汉书》的评论	(218)
二、漫谈汉高祖刘邦的传播活动	(227)
三、楚汉相争中刘邦成功的宣传战	(237)
四、小议西汉养马业	(248)

自序

1985年7月，大学二年级暑假，我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83级的一百多位同学一起踏上了从重庆到西安的列车，去完成我们期待已久的见习考察。这次西安之行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令自己始料未及的是，茂陵的汉代石雕以其雄浑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对草原、大漠、英雄、骏马产生了几分浪漫联想，对西汉历史的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播撒。西安回来之后，自己的关注和阅读，大多与西汉历史有关。1987年，我大学毕业顺利考上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赵淡元先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学，自己对西汉历史的兴趣开始发芽抽枝。因《汉书》是专记西汉一代历史的史书，所以，对《汉书》的关注自然比其他史书更多，我开始将《汉书》纳入自己的阅读计划之中。对毕业论文选题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一部分学者欲对《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评价之际，我便毫不犹豫，参与其中，写出了毕业论文《〈汉书〉史论研究》。毕业之后，自己整理了毕业论文的部分内容，以《〈汉书〉史论的评史方法》为题，发表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该文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之《历史学》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这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以莫大的信心，鼓励着我坚持阅读、学习《汉书》。攻读研究生期间对《汉书》的阅读，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

《汉书》，也为工作之后继续研习《汉书》打下了基础。

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承担的课程除“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以外，还开设了“中国史学名著导读”“文史哲名著赏析——《汉书》赏析”等课程。工作至今二十余年，承担过十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自己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过彷徨，也有过坚持；有过困惑，也有过期待；有所失去，也有所获得。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四川教育学院由一所省属成人高校转制为普通高等学校（成都师范学院）的变革，自己的工作岗位、担任的教学工作以及所教课程等，均因工作的需要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无论白云苍狗，亦无论春夏秋冬，学生时代对于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兴趣始终伴随着我，如影随形。我对《汉书》的阅读和学习，也在日积月累中有所进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心得，于是有了纂集成册的想法，前贤既多，不敢妄称著述，遂名之曰《〈汉书〉论稿》。

本书的内容既来自自己发表过的论文，也有自己形成于教学过程中之文稿，还有自己阅读和学习《汉书》之随笔。本人阅读学习《汉书》有一基本路径，首先，对作者和《汉书》进行总体的了解，以通观全貌为要。其次，阅读《汉书》史论。因《汉书》史论集中体现了班固的思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在整体了解的基础上，通过《汉书》史论进一步了解作者思想和《汉书》各篇内容与主旨。第三，逐篇阅读《汉书》，并对其中一些基本的、重点的或热点的问题进行专题研习，对《汉书》的研习亦由此延伸至对西汉历史的研究。按照这样的路径，本书共分为6章：第一章，《汉书》——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总体介绍《汉书》及其成就；第二章，《汉书》的史论及其评史方法；第三章至第五章，均为专题研究，分《汉书》的民族史撰述、《汉书》的鉴戒史观和神鉴史观、《汉书》四志述评这三个专题；本书第六章汇集了作者多篇与《汉书》有关的论

文，内容由《汉书》延伸至西汉历史。本书的一些内容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学术杂志上，但因发表学术论文受版面等因素限制，故取舍之间常不能尽情抒写，这些内容经过修改完善收入本书，亦可弥补此憾。本书还有一些内容借鉴了其他学者的观点，除文中注明的外，尚有未能一一注明的，亦在此一并感谢！

不觉已是2014年4月，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将按计划完成本书，没想到的是交稿临近，自己又来到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学习之余整理文稿，想想自己与《汉书》的缘分结于无心，成此书于北京亦属无意，再想想自己人生中的诸多事情，不外乎栽花插柳，与其苦心焦思，不如顺其自然，亦如现在的北京，虽还有几分凉意，但已是姹紫嫣红。看看这花团簇锦，心里就会明白，春天来了，花自然就开了。

是的，春天来了，花自然就开了，每每想到这里，便觉春风徐来，心中不禁开阔晴朗起来。

庆幸的是，在我普通却并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中，有家人、老师和朋友的相助相伴，是你们让我拥有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情谊，让我知道人生的美好；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坚持内心的追求。你们给予我的我无以回报，心中的感激亦难以言表，谢谢你们！

祝好人一生平安！

田文红

2014年4月20日于北京

第一章 《汉书》

——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

一、《汉书》的编撰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创立的纪传体通史体裁，在先秦已有的编年体之外，又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史学新领域，纪传体从此成为我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被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史记》以其卓绝的成就光耀史坛，在《史记》成书以后的百余年间，问世的史学著作大多为《史记》的续作，其中，褚少孙、刘向、刘颜、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班彪等人的续作比较有名。续修者如此众多，可见《史记》影响之巨大。但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即百余年间，学者们在史学著作的体裁和思想内容上难以在《史记》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这些续作无非是在《史记》几近完美的画卷上修残补缺，难以反映历史发展的新形势，其成效也大多差强人意。所以，这些续作几乎都湮没无闻，现在能见到的仅有褚少孙和班彪二人的零散段落。其中，褚少孙写的部分段落因附于《史记》之中，而被保留下来；班彪续写《史记》的一些内容亦因被保留在班固撰写

的《汉书》之中，而得以流传至今。正是这部《汉书》最终结束了史学在司马迁巨大成就之下的徘徊与逡巡，使得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 and 动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汉书》以其创新和开拓，将我国古代的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一）成于众手的私修巨著

《汉书》作者题班固撰，但该书实际并非完全出自班固一人之手。据《后汉书》的《班彪传》、《列女传》记载可知，前后共有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个人参与了《汉书》的修撰。此四人中有三人均出自班氏一门，四人编撰《汉书》的情况如下。

1. 班彪续写《史记》

班彪（3年—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彪富有才华而且喜欢撰史，他潜心研究史籍，认为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从武帝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后来的学者虽也有人续写《史记》武帝以后的史事，但大多鄙俗，不足以成为《史记》的续作。所以，班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人考证他写的《史记》“后传”有65篇。正是这本书触动班固产生了撰写《汉书》的理想，该书也成为班固撰写《汉书》的依据和蓝本，《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就是班彪的原作，《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语有“司徒掾班彪曰”的文字，也是班彪的手笔。所以，班彪应是编撰《汉书》的第一人。班彪曾写下《王命论》一文，阐述其“王权天授”的观点，并以此说明刘汉政权是继承唐尧之德，是天命所归，天下人不能无视天命而与之争雄的道理。班彪也曾评价司马迁和《史记》，认为《史记》史料丰富，善于叙述事理，文章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司马迁是具有“良史之才”的优秀史学家。但是，他对《史记》

的许多思想观点却不赞同，主要在于“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他的史学思想和“王权天授”的观点对他的儿子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书》具有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宣扬汉得天统，在《汉书》的《司马迁传》中，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与班彪所评几乎如出一辙，等等，均体现出班固受班彪的影响是很深的。班彪的社会关系最终也影响到班固的人生命运。班彪曾投奔大将军窦融，并成为窦融幕僚，从此，班、窦两家产生了联系。直至班固后来因窦宪一案而牵连入狱，最终猝死狱中，班、窦两家的关系才划上了句号。

2. 班固撰写《汉书》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县（今陕西咸阳东）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据《后汉书·班固列传》记载，班固9岁便能颂诗赋做文章，16岁进入太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通典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23岁时，因班彪去世，还乡居丧。他在看到了父亲所写的《史记后传》后，认为此书“所续前史未详”，便决心完成父亲未竟事业。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27岁的时候，开始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永平五年（62年），班固30岁时因被人控告私改国史，而被捕入狱。弟弟班超担心他不能自明，便“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班）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在班超的辩解下，汉明帝审阅了班固的书稿，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召他担任兰台令史，掌管宫廷藏书，校勘图书典籍。他参与编写的《世祖本纪》和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二十八篇奏上，深得明帝赞许，于是诏令班固在兰台继续撰写《汉书》。期间，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讲论六经异同，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工作，编成《白虎通德论》。建初七年（82年），班固50岁时，

《汉书》大体完成。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60岁时，受窦宪谋反案牵连，免官，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班固撰述《汉书》前后历经三十余年，是《汉书》四位作者中用力最深的一个。

3. 班昭续史

班固猝死狱中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续完《汉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妹妹班昭的身上，和帝诏令班昭在东观藏书阁完成《汉书》的编撰。班昭小班固17岁。《后汉书·列女传》有班昭的传记，记载班昭生平事迹：“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曹）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后又诏（马）融兄（马）续继（班）昭成之。”《后汉书》的上述记载为我们描摹出一代才女班昭不凡的经历和事迹。班昭是曹世叔的妻子，又被称为曹世叔妻、曹大家，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博学高才”。在班固死后，班昭受诏在东观藏书阁续写完成《汉书》，班昭成为二十四史众多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史学家。除续写《汉书》以外，班昭还是和帝皇后邓皇后的老师，在邓太后临朝以后，班昭曾参与政事。班昭还为当时的学者马融等人讲解《汉书》，为《汉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4. 马续续修

班昭去世的时候，《汉书》的编修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朝廷又诏令班固同郡学者马续完成。马续“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根据班昭和马续的学识、特长，有可能是班昭续修了

八表，马续则完成了《天文志》。

如上所述，《汉书》的编撰，从班彪创始至《汉书》最后完成，经历了80多年，前前后后有4个人参与了《汉书》的编写，《汉书》的作者实际上有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其中，班彪写作的《史记后传》65篇成为班固编写《汉书》的基础。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他不仅创立了断代史的新体裁，而且撰写了《汉书》的主要部分。《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纵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班昭续写的是《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马续继续完成班昭未完成的部分。至班昭、马续，方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修。

班固、班昭和马续虽然都曾奉诏修史，但与后来的官修史书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这三个作者都是在前一位作者未能完成编修的情况下，接续撰写，而且都是各自撰写，相互之间没有合作，而后世的官修史书一般都是众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修撰的。第二，虽然奉诏修史，但是主要作者班固最初是私撰，还因此下狱，并不是一开始就奉诏的。后来班昭和马续的奉诏，都是为了续写班固没有完成的内容。第三，没有设立专门的史馆和类似宰相监修的制度。《汉书》的作者都是在没有监修的情况下完成修撰工作的，这与后世官修史书设史馆和监修的做法也不相同。所以，《汉书》虽然成于众手，但却是一部成于众手的私修巨著。

（二）影响《汉书》编撰的因素

1. 时代的影响

《汉书》成书于东汉国力强盛的明帝、章帝时代。班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汉光武帝为重建统一的国家而大有作为的时期。光武帝结束西汉末年的动荡和战乱之后，便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治理国家，致力于休养生息，奖励生产，颁布了许多诏令，例如：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轻徭薄赋；治理因王莽改制而造成的货币混乱，恢复过去的五铢钱；精简机构，整饬吏治等。为减轻民众负担，实行宽缓的政策；光武帝还经常为缓解民众疾苦，与大臣进行讨论、商议。上述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东汉建国之后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后来即位的明帝和章帝，承接光武帝的作为，继续实行发展生产、强国富民的措施，在奖励生产、整饬吏治、治理黄河、平定匈奴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例如，明帝曾接连下诏督课农桑，章帝为恢复生产还下诏免收田租，并令各地将无主耕地给予贫民耕种。这些措施改变了东汉初年田地荒芜、凋敝破败的境况，迎来了粮食丰足、牛羊遍野、户口增殖的发展局面。永平九年（66年）谷价低至每斛仅值三十钱，对于一个将农业作为经济支柱的王朝而言，粮食的价格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国家富裕的指标，永平九年谷价的低廉足以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的良好形势。同时，明帝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取得了击败匈奴、西域内附的成就。东汉时期，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内附之后，北匈奴仍时常侵扰北方边境，并控制了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将军窦固等出击北匈奴，在天山和蒲娄海置宜禾都尉，实行屯田。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在这年出使西域。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首次在西域设置都护和戊己校尉，汉匈之间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和帝永元元年（89年），将军

窦宪出击北匈奴，58岁的班固也随军出征。他们出塞三千里，在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永元三年（91年），汉军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向西远徙，从此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离开了蒙古高原。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兴起至此，匈奴纵横大漠南北三百年的历史就此结束。匈奴的西迁也使东汉最终实现了西域内属归附。长期威胁中国北方的匈奴被击败，西域五十余国的归附，成为东汉初期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史称“天下清静，庶事咸宁”。

正是在东汉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环境之中，产生了《汉书》。所以，《汉书》体现出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信心，带着时代的精神和气质，成为了气魄宏大的史学巨著。

2. 史学自身的发展

一部杰出的史书能够诞生，与史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史学作为通过利用史料来研究和描述人类历史的学科，包括了人们占有史料、认识历史、研究历史，以及进行历史编纂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史学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取得相应的发展，它的发展大致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一致。同时，史学自身又因为思想、认识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谢保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将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分为5个基本阶段：秦以前为史学形成阶段，汉初至唐前期为史学地位确立阶段，中唐至明末为史学发展、各成系列阶段，清前期为传统史学走向终结阶段，清后期为史学开始裂变阶段。从谢保成先生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来看，《汉书》诞生在中国史学地位确立的两汉时期。这一方面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成果；另一方面，《汉书》的诞生也对中国史学的确立和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了解《汉书》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可以更好地理解史学自身的发展对《汉书》的影响，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汉书》的内容和成就。

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口耳

相传、结绳记事均体现出原始的历史观念和保存历史记忆的方式。原始的历史意识在殷商以前便产生了，从殷商至春秋，经历了口述传说、成文记事、巫史分离、史官、史书的发展历程。

(1) 先秦史学的成就

①先秦的史官。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都说到周代的史官设置情况，如《隋书·经籍志序》记载，周代的时候，周天子的史官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五史，诸侯也各有国史，他们的职掌大致是“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由此看来，周代的史官设置较周全而且分工明晰。史官平时还要在朝廷上对发生的事情、君臣的言行进行即时记录，记录之时也各有职分，内史居左，太史居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就是为国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记事，就是负责记录平时发生的与国家有关的一些事件，包括人事活动和自然界的重大变化。相应的，先秦史书大致可以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夏、商、周三代的史官，其职责如后世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主要负责保管典籍，记录时事，起草文书，宣达王命，献书规劝，讲解史事，同时负责祈祷、享祭、占卜等宗教活动。春秋时期出现了以南史和董狐为代表的优秀史官，他们被后世史家奉为楷模。据《左传》宣公二年（前607年）的记载，晋灵公荒淫暴虐，被将军赵穿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为躲避晋灵公对他的刺杀正在逃亡途中，但还没有走出国境，听说晋灵公已经被赵穿杀了，便回到都城。内乱平息之后，晋的太史董狐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出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坚持这样记载，赵盾对此也无可奈何。孔子

知道此事后，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记载，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太史的弟弟还是这样记载，又被杀害了；太史的另一弟弟仍然这样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好放了他。南史听说齐太史都死了，“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从董狐和南史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史官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像南史和董狐这样的史官可以为了坚持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和职业操守而牺牲宝贵的生命，统治者因畏惧自己的恶行被记录下来，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正是因为有史官，才有诸侯国的编年史，如晋的《乘》、楚的《梼杌》，齐、鲁、宋、燕的《春秋》等。我国最古老的文献著作《尚书》极有可能出自这些史官之手。墨子说他见过百国《春秋》，可见周代的历史典籍是很兴盛的。

②先秦的史书。从史籍编纂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史书按记载的内容，可以分为记言和记事两类；按编纂的形式，则可以分为分类编纂和按年编纂两类。

分类编纂的史书。迄今所见最为古老的两部书是《诗经》和《尚书》，它们是分类编纂的杰出代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自从有诗以来，口耳相传并被记录下来的应有三千余篇，到春秋时期，已经有人对它们进行编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记载，早于孔子的郤穀因善于研究《诗》、《书》而被赵衰推荐给晋文公担任晋楚城濮之战的统帅，可见在孔子之前已经编纂了《诗》、《书》。后来，经孔子筛选出“可施于礼义”的305篇，上起商、周始祖，下至西周末年的幽厉时期，分为风、雅、颂三类编纂，体现出此时历史文献分类编纂的成就。至于《书》，经过孔子整理之后，也是选出了“足以垂世

立教”者，分类为典、谟、训、诰、誓、命进行编纂。《尚书》还以时代为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并按时代先后顺序编纂成书。分类编纂表明人们已经具有了历史编纂的意识，《诗》可视为史诗，《尚书》则是历史文献的汇编，而连贯记述历史的史书，则是随着按年编纂的出现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按年编纂的史书。在按年编纂之前，应该经历过简单纪年的时期。《国语·周语》的纪年开始自周宣王，《史记》明确的纪年见于《十二诸侯年表》，该表“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中记载“庚申，周共和元年。厉王子居召公宫，是为宣王。王少，大臣共和行政。”据《集解》注释，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迄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可知，年表所记周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古籍记载的最早的确切纪年，表明《史记》所记最早的按年编纂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有人认为，这可算是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史记》的这一确切纪年是历史编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是我国历史记载得以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重要开端。共和元年之后，又过了三百多年，我国第一部按年代顺序编撰的史书《春秋》问世，编年史正式登入我国史学的大雅之堂。《春秋》依照鲁国12位诸侯王在位的顺序，记述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大事，后人称这个时期为春秋时期。《春秋》一书按年编纂，正如史学家杜预所说，是按照“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体裁“属辞比事”。这种逐年记事的方式，也就是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这就与分类编纂的《尚书》有了显著的区别，体现出编年史的根本特征。所以，人们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